

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 与实践探索

——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年会论文集（2006）

张兴茂 主编 王建刚 副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 与实践探索

——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年会论文集（2006）

张兴茂 主编 王建刚 副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年会论文集. 2006/张兴茂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7

ISBN 978 - 7 - 80211 - 482 - 1

I. 社...

II. 张...

III. 社会主义 - 理论研究 - 文集

IV. D033.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9747 号

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

出 版 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朱 虹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130345(编辑室)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 787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346 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目 录



社会主义基本问题

- 中国改革和发展关键时期的“主义”选择 黄宗良/3
- 论动态的社会主义标准及其实践意义 俞良早/13
- 高扬“两个最彻底的决裂”伟大旗帜
- 再论西柏坡精神 斯苏民/22
- 浅析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 徐 燕 冯青淑/41
- “革命的敌人”能成为革命“遗嘱执行人”吗
- 谈谈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及趋势 边鹏飞/55
- 自由与秩序互动共存：社会政治稳定的价值规定性 冯宏良 余金成/65

社会主义与和谐社会

- 政治宽容与社会和谐 宋玉波/77
- 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 季正矩/87
- 试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贫困群体的生存权保障 王 瑾/95
- 江泽民农村扶贫思想的逻辑蕴涵与时代价值 孙迪亮 陶正付/112
- 河南在和谐发展中加快发展 郭书城/120
- 构建和谐杭州的理论与实践 熊乐兰 詹真荣/124
- “新公共服务”浪潮与我国政府职能的新定位 向 波/140
- 论“和谐世界”思想的重要意义 陈正奎/151

社会主义与执政党建设

思想上先进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关键

- 毛泽东对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贡献 杨根乔/161
-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探源 张保和/169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社会党

- 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复活” 胡振良/177
- 罗莎·卢森堡与社会主义民主 王学东/182
- 冷战后发达国家共产党的变革与走向 陈元中 于晓媛/188
- 拉美左翼的重新崛起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吴世韶 陈洪江/200
- 西欧社会党的国家理论探析 薛新国/213
- 社会党国际全球治理思想的进度与限度分析 涂用凯/223

生态社会主义

- 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解读 郭尚花/239
- 生态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王宏斌/247
- 生态社会主义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康瑞华/255
- 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发展观对我们的启示 张振岩 张晓蕾/269

国际共运史若干问题

怎样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 谈列宁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科学方法 林志友/281
- 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的研究述评 刘 霏/289
- 苏联所有制结构的历史演变及其理论反思 张兴茂/298
- 一种异端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 论吉拉斯写《新阶级》的原因 项佐涛 孔寒冰/310
- 从几件重大史实看托洛茨基 尹 彦/323
- 如何认识中苏大论战的实质 李明斌/335

附录

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 2006 年年会开幕词	顾锦屏/351
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 2006 年年会上的致辞	黄亚彬/354
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 2006 年年会闭幕词	黄宗良/357
后 记	/360

社会主义基本问题



中国改革和发展关键时期的“主义”选择

黄宗良

一、“问题”之中有“主义”：第三次大争论的背景及其实质

邓小平曾提出“不争论”的方针，而且说，这是他的一个发明。笔者理解小平倡导“不争论”意在争时间，重实践，勿因争论坐失良机，让实践去作结论；“不争论”是在某种条件下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方针和政策。但从理论上说，在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中，因不同主张引起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围绕着“市场”问题大的争论就有三次。通过争论，我们对关系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有了更明晰的认识、更自觉的行动。当然，中央高层领导、全国重要媒体在“争论”过程中“不介入”，可以保证全国大局平稳，全党行动统一。

在第三次大争论中，涉及“问题”与“主义”的久远话题。80多年前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著名口号，一直受到批判。但我们党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上，也曾出现过一些偏差，把“主义”当成教条。一些自称马列主义者也喜欢动不动用“主义”作为棍子打人，上纲上线，使得这种语言习惯很不受欢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重新认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慎谈“主义”，少用“主义”吓人、压人，这是对的，何况不少问题本来就不属于“主义”的范畴，如“市场经济”、“权力制衡和监督”等。但仍有少数人成天嘴上挂着“姓社”、“姓资”的话，不怎么得人心。

不过,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实际上还是存在对于“主义”和“制度”的选择的。“主义、制度好比行船的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地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①果然,这次争论把不少人引向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老问题的新思考上来。

引起这次争论的背景是改革到了世纪之交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贫富悬殊,困难群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官员腐败,国企改革,土地征用中的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恶化等等。争论的主要不是上述问题是否存在,而是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将怎么走?

概括起来说,“非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主流经济学家”打着改革的旗号搞私有化,打着市场化改革搞资本主义,“国企改革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上述问题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中国改革的结果;改革搞得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将改变颜色,共产党将面临丧权的危险……

“主流经济学家”则认为对方是借反思改革反对改革,借批自由主义主张回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认为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改革还不到位,而不是改革方向出了问题;当前社会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全面快速的的增长同公共品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体制上的原因则是政府还没有实现由经济指导型向服务型的转变。

争论以2006年3月“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关于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表态告一段落。更为重要的“表态”当然应属于近两三年来中央出台的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坚决而有步骤地解决前述的矛盾和问题。

人们把胡总书记和温总理的讲话视为大争论的总结。但笔者觉得,“总结”不等于“终结”。认识的分歧是很难在较短时间里消除的,它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如何看待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上述问题呢?

这里不把争论的双方分成什么“改革派”与“保守派”、“右派”与“左派”。因为两派的人员及其观点是复杂、甚至是多元的,不能一概而

^① 《独秀文存》(合订本),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9页。

论；即使某一“派”总体上是对的，也不是全对。

二十几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政策、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否定。对近年来凸现的问题必须作具体分析。比如说，牵扯全社会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首先就必须承认改革以前中国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农民）基本上是处在贫穷状态下的，那时差距小，但那是平均贫穷！现在大多数城乡居民均已从温饱走进小康。拿住房来说，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由4平方米增加到20平方米。必须看到这一最基本的事实，才能不因存在问题而否定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巨大成就。今天的中国，尽管出现富有的阶层，又出现失地、下岗失业的困难群体，但中间收入阶层在扩大，并将在正确政策的指引下继续扩大。社会发展趋势是“社会中间阶层化”。而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则是改革以前就存在的老问题，只是由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和发展的不平衡而更加显现了。环境的恶化则是发展中出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也不能完全否认我们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局部性的方向性、涉及“主义”的问题。教育领域的改革、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确有“过度市场化”而损害社会公平原则的问题；国企改革、土地征用中就存在少数人借改革的名义掠夺国有资源的问题；而贫富差距过大已经使我国基尼系数高于被我们视为资本主义的许多国家了。有人不承认有资产流失，说老百姓懂什么经济学呢？！笔者倒觉得这种人可能由于远离老百姓而根本不懂得穷人经济学了。

我们起码应该清醒地看到，如果不正视矛盾和问题，不按科学发展观作政策上的某些调整，转变增长方式，就会在“主义”和“制度”上出大问题。笔者认为，中央这几年来在分配政策、三农问题、教育、医疗卫生制度、社会保障、土地管理等各个方面采取的方针、政策、举措，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以实际行动来不断端正我们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一系列重要制度、法规的建立、健全和完善，正体现了党和政府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作出的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特别是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决断和选择。

二、经济问题之上的政治：建设廉洁的政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干工程

当前中国的许多问题，表现在经济（钱、财、资源等）上，反映的是

政治体制上还存在缺陷；而政治问题则集中到权力的正确使用和制约、监督问题上。

第一，贫富差距过大是中国当前牵动全社会的普遍问题。“富”的一端有互相勾结的两种人：为官不正——官员中的腐败分子，为富不仁——违法经营暴富者。笼统地说，民众“仇官仇富”是不确切的。民众真正痛恨的是上述两种人，而许多“奸商”是以贪官为后台的，以权力的腐败，起码是以有人滥用权力、谋取私利为条件的。垄断行业也是以有权力的垄断为背景的。贫富悬殊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政治机制上有问题。

第二，土地资源的流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少了1亿多亩。1990—2003年卖地所得的1万多亿元，落到农民手里有多少？政府以国家名义征地，真正有权批地的是少数官员。他们非法批地、违法用地，贱卖国土资源，同房地产商勾结，大肆掠夺土地，亏了国家和农民，肥了自己。一个统计说明，巨富中有一半是经营房地产或与此业相关的。国土资源部检查发现，2004年9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被查城市违法用地的少的占60%，多的达90%。^①就是说，这些城市用地中，多半是违法的。土地管理问题上的官员腐败问题成为引发不少群体冲突事件的主要原因。中国社科院的一个调查表明，在调查的130起群体冲突事件中，有87起（占近70%）是“土地纠纷”造成的“警民冲突”，这里的“警民”冲突说白了就是“官民”冲突。可见，备受关注的“土地问题”的出现的重要诱因就是个别官员利用管理制度的不健全大发“横财”。

第三，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民众为何看病难、看病贵？突出原因有二：一是医疗“过度市场化”，“新药”大多是“新瓶装旧药”，花样翻新，价格则成几倍、几十倍地上涨。在从研制到销售的利益链条上，关键的环节是有权批准生产新药者。一个批号，一个“准”字，价值万金。“权力”在这里直接变成“金钱”。二是我们不仅在公共医疗卫生事业中政府投入少，而且投入的公共产品相当一部分又为干部们所占有。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透露，中科院的调查报告说，在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

^① 张晓松：《国土资源部：严重土地违法几乎都涉及地方政府》，参见《新华网》2006年6月6日，新华社北京专电。

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体的群体服务的。有200万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40万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招所、渡假村,一年开支500亿元。^①

第四,经济决策的失误暴露了民主、科学决策的体制和机制的缺失。决策失误最有代表性的是,改革开放以来6000多个开发区70%被撤销了。有的地方干部中肯地指出,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腐败。李金华署长的说法是,决策的失误比腐败更可怕。他在一个公开的报告中说,审计署审计了10大中央企业领导干部的经济问题,共查出16亿,但这些企业决策的失误和经营不善损失的竟是145亿!^②问题常常出在有的干部权力观、政绩观不正,为了自己加冠进禄,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个别人拍拍脑袋,决策定夺。不讲民主,决策怎能“科学”呢?!这是危害最大的滥用权力。

第五,在社保、教育、公共卫生医疗事业中,政府的投入比例小,这使贫富差距、社会不公更显突出,对公共卫生政府的投入在发达国家占70%,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一般也在55%以上,而我国政府投入的比例在2004年仅占17%。^③与此相对应,我国行政开支占财政总开支的比例比国外大得多,而且年年猛升。1978年我国行政开支占财政总支出4%多,2003年增至19%,2005年为24%。2003年日本为2.38%,美国算较高的,为9.9%。^④

钱用到哪里去?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出国考察开销太大。有的说这三项共9000亿,有的说6000亿。据有关报道,2004、2005、2006年仅买公车分别开销为500亿、600亿、700亿(预计)。^⑤据有关文章透露,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这里我们不唱高调,这三项开支一年省下2000亿应是可行的。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2004年,企业职工基本养

① 周凯:《专家官员直面现实勾勒医改新方向》,载于2006年9月19日《中国青年报》。

② 尹卫国:《警惕比腐败更可怕的决策失误》,载于《半月谈》,2006年第3期。

③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学习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页。

④ 刘声、番圆:《任玉珍委员称我国行政管理费用25年增长87倍》,载于2006年3月6日《中国青年报》。

⑤ 龙大江:《防治公务接待腐败》,载于《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44期。

老保险基金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市民低保三项共用 1035 亿、中央和地方财政用于社保总支出为 1521 亿。^① 举世闻名的三峡工程总共用 2039 亿。2000 亿，足以使全国两亿中低收入农民经济生活上一个大台阶！现在全国农村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的约有 7500 万人。

由此可见，廉政建设在维护社会公正、在实践我党的执政为民、在巩固党的执政社会基础中具有何等重大的政治意义！为什么这次大争论开始时，有 90% 的网民支持郎咸平的观点？为什么陈良宇一落马，上海有的市民放鞭炮庆祝？把建设廉洁的政府作为政制改革的主干工程来抓实在是太必要了。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出现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反映的是政治体制、政治权力的问题。列宁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②

三、有序民主基础上的有限的集权：在四位一体的体制建设和改革中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中国必须着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其他的体制建设和改革就难以顺利推进；政治体制建设和改革必须朝民主化方向推进，否则适应不了社会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说，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正视和处理好社会矛盾，协调好各方的利益关系。在社会关系中，官民关系、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处于中心地位，处理好这些矛盾、关系，最突出、最重要的就是廉政建设了。

正如六中全会的决定所提出的，“党风正则干群和，干群和则社会稳”（这里的“党风”可作广义理解）。在决定的最后一节“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以正确行使权力为重点，用改革的办法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以保证廉洁从政为目标，加强对

^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65、469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07、408 页。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建设服务型政府”。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模式，有的学者概括有五种，即咨询型的法治政体说、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其公式是权威主义政治 + 自由市场经济 + 法团主义 + 福利国家）、民主国家体制建设说、“增量民主”说、民主的法制型体制说。中央党校的一个课题组的政改方案提出“前东亚模式”，方案似有些强调权威，有的评论说这个方案“保守”，其实方案还是切中时弊，设想的改革不少很有力度。

笔者不习惯用什么“模式”来限制自己的思路、表述自己的“方案”。基本的方法是从当前中国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出发，以目前政治体制和机制为基础，把现状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国政治特点与世界民主化潮流、国外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综合起来考虑。目标是建设健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

在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危险是什么？最需要我们警惕的是什么？能否避免这种危险？

最大的危险是政治上维护权力垄断，即维护斯大林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保护其体制的弊端；经济上效仿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即垄断的政治权力 + 自由市场经济。掌握着权力的某些官员，抵制民主化和提高政治透明度，与奸商相勾结，讲“市场”不讲社会主义，利用权力在市场经济中浑水摸鱼，明抢暗偷，掠夺国有资产和社会财富，暴富起来。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关键时期，由于市场不规范、法制不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远不完善，正是垄断政治权力和自由市场经济二者结合的可乘时机。这种结合的实质是贪官 + 奸商。如果这种结合由局部性发展到全局性、全国性，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党和社会制度就变质了，苏联悲剧就将在中国重演。

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几个方面的体制建设和改革中，当前关键的环节还是政治权力。因此不仅是从现实的情况，而且也是从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上看，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最突出的任务就是要坚持不懈地通过政制改革，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以便阻遏和逐步削减、消除大

小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僚特权阶层。

完成这个任务是一场长期的艰苦斗争。

这是一场维护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一场维护共产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社会基础的斗争，是一场防止苏联剧变在中国以不同形式重演的斗争！

实行垄断的政治权力+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有某些社会力量和一定的理论氛围的。经济学界的争论实际上已触及这个问题，政治学界的动向也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中一些错误的东西仍在顽强地表现自己，非唯物史观的东西在一定范围、一定的层次上还在张扬自己。尽管邓小平同志对此有过明确的正确的说法，尽管我党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理论上有了重大进步，把以人为本作为重要发展观念，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宪法，把政治文明建设庄重地提出来，把构建和谐社会突出地作为战略任务提出来，所有这些明显是走出了斯大林的政治模式的可喜进步，但仍然有人自以为是地提出，中国因为批判了“人道主义”才没走苏东剧变的路，有人拐弯抹角地提出应重新评价斯大林30年代大镇压的问题。这里的重新评价就是给以肯定。他们所推崇的是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使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伤筋动骨的斯大林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有没有一件东西既能阻挡垄断权力又能阻挡新自由主义呢？有！这件东西就是既不同于苏联的政治模式，又不同于西方民主模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中国需要共产党领导的权威，需要中央政府适度的集权，没有这种权威，就无法保证全国政令统一、全党意志统一、行动统一；没有这种权威连反腐惩恶、维护社会公正都无法进行。但权威与集权只有置于民主的基础上才能保证权力的社会主义性质，才能使这种权威强大有力量。民主又是阻挡新自由主义的强大力量。因为近年来中国的实际又一次确切地证明，新自由主义是同社会主义难以相容的东西，而社会主义有着新自由主义不可战胜的力量，因为广大民众是拥护以社会公正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的。

因此，笔者的主张是有限的集权和有序的民主。

有限的集权，即肯定党的领导的权威、中央政府的权威，但这权威必须受到限制。我们改革的方向，是限制斯大林政治体制模式的过度的集权。用什么来限制？就是用民主来限制，用法律来限制，用制度来限制，用党务政务的公开性来限制。

有序的民主，即有领导、有组织的民主，可控制的民主，不是大轰大嗡，不是街头政治，不是无政府主义，不是极端的自由主义，是既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又要避免动荡和混乱，社会稳定和谐的民主。

就体制的改革而言，笔者认为突出的有几项：

第一，实现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从体制上解决政府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既是管理者，又是监督者的状况，杜绝一些政府部门“与民争利”、“自身利益化”现象。特别是要强化和细化各级人大对财政开支的决策权和监督权。

第二，干部任用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是关键环节。苏式政治体制弊端之要害是用自上而下的普遍的委任制使民主选举流于形式。这是执政党脱离其执政基础的制度根源。改革的着力点是把“党管干部”原则同民选、民监有机结合起来。根据国外一些执政党的经验教训，各级党的主要领导干部要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民主形式得到党外民众的认可，以增强党权的合法性、解决仍然存在的“人民不要党要”的怪现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执政为民的宗旨。用人失察要根据情节予以追究、查明，同时大力表彰勇于顶住用人不正之风的好干部。

第三，解决决策的民主与科学体制和机制问题是一项突出的任务。大量事实表明，没有民主决策就谈不上科学决策。成熟的民主机制本身也是“科学”的内涵之一。脱离广大民众、脱离利益相关者，只靠少数干部和精英决策不能不犯错误。实际表明，少数干部、社会精英还不能完全表达民意、民心、民利，必须酌情加大民众或相关利益群体的代表在各级立法机关、决策机制的比例。现在全国人大中工农代表是18%左右，而改革开放时是46%。在关系公众利益的决策上，特别要警惕有的地方和部门可能出现的贪官+奸商+某些违背科学良心、依附前二者的“知识精英”的决策。

第四，扭转党内不正之风。这已经不是“体制”问题了，但这是体制